

# 澳門歷史話語權的回歸

吳志良

---

**[提要]** 澳門本土歷史知識的取得，從過去由境外學者逐漸轉變為由澳門本土學者主導，研究的主體也轉向澳門內部社會的演進，這不但標誌著話語權的回歸，而且為澳門的學術自主和澳門學的學科建設得以順利開展，以及實現普世話語的正面反饋創造了條件。展望將來，澳門學的學科建設應集中在確定學術規範的具體內容和技術操作以及探索澳門模式的宏觀特徵和微觀內容兩個方面。

**[關鍵詞]** 澳門 歷史 話語權 澳門學

**[中圖分類號]** K0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3) 02 - 0020 - 04

---

澳門歷史研究近 30 年來的進步，有目共睹，在國內外學界也備受關注和讚賞。澳門公共機構和社會團體聯合外地研究力量，不僅收集、整理、出版了大量的檔案、文獻史料，為廣大研究者提供了極大的方便，為未來更深入、全面、系統的研究提供了必要條件，研究成果量的增加和質的提升以及研究隊伍的不斷壯大，也令澳門歷史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飛躍，特別在研究深度和廣度的拓展以及在諸多向來極具爭議問題上學術觀點的交集、接近方面，進展令人欣喜。<sup>①</sup>

不過，在我看來，澳門歷史研究最值得稱頌、最值得驕傲、最具深遠意義的成就，是澳門歷史話語權的回歸，是澳門學術自主性的初步確立。

所謂“話語”，從本質上探討是人類在獲得知識的最終成果過程中，誰主導獲得知識的地位，即構成話語權的取得，當中涉及表達和參與兩個方面。從澳門史學史的發展歷程觀察，歷史知識的取得從過去由澳門境外學者主導，逐漸轉變為由澳門本土學者主導，研究的主體也轉向澳門內部社會的演進，實現了歷史話語權回歸本地，換言之，澳門本土研究力量的日益壯大，其表達和參與的頻率增高、深度和廣度加大以及對澳門本身關注度的日益加強，導致了量變產生質變的最終結果。

眾所周知，澳門歷史研究最早是圍繞中葡主權治權之紛爭而展開的，因此，澳門歷史研究從

一開始就染上了極其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中葡兩國政治家、史學家對澳門歷史的敘事與解釋長期存在巨大的分歧，在許多重大問題上甚至南轅北轍，澳門歷史研究的核心內容也長期受限於政治史、中葡外交史、中外交通史的主線而無法轉向本地社會內部演進的研究，無法確立“以澳門本身為主體的研究路徑”<sup>②</sup>，澳門本土知識體系及其解釋體系一直無法形成<sup>③</sup>。澳門歷史的話語權也猶如其外向型經濟那樣隨波逐流，一直為外部因素所主導。

話語權之回歸，首先是研究人員主體的本地化。20世紀70年代中，澳門的政治法律地位得以明確，澳門社會各界、特別是逐漸成形的知識界，不斷努力尋求確立澳門自身個性的必要手段和途徑。同時，隨著居民教育水平的日漸提升、特別是高等教育的普及和攻讀碩士、博士人數的不斷增加，以及當局在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上的投資大幅增加，願意潛心從事歷史研究的本地學者和人士也日漸增多，三、四十年後終於發展成為澳門歷史研究的中流砥柱。而本地學者的研究重心，自然地指向本土社會。

其次，是研究課題和研究成果的本地化。在過去30年間，澳門基金會和其他機構均不遺餘力地投入在推動、資助和組織史料以及研究成果的挖掘、整理和出版的工作中，並且在確定研究課題時，更多地考慮本土視角，逐漸將焦點轉向對澳門內部社會演變的考察。隨著挖掘整理檔案史料不斷深入，一些過去被學術界忽視的材料，例如口述歷史、實物史料和圖像史料，亦引起澳門歷史學者的興趣和關注，相關的嘗試和成果已初見端倪，諸如《十部文藝志書集成·澳門卷》、澳門記憶工程等更大規模的研究已經展開。口述歷史、實物史料和圖像史料不但彌補文獻史料的空白和不足，也是論證文獻史料真偽的有力途徑。而這些元素最豐富的地方，就在能取得第一手歷史體驗、歷史參與人數最多和最集中的澳門，從而更加強化了澳門歷史研究的本土性。

再次，聚焦澳門內部社會變遷研究，史觀分歧逐漸拉近。這不但是本土歷史話語體系建立的前提，也是確立本土歷史話語體系的必要進程。最近30年來，澳門的公、私機構對中國和葡萄牙以及其他國家有關澳門的檔案史料整理和翻譯做了大量的工作，並出版了不少成果。澳門歷史檔案資料的最大特點在於數量多、語種多、收藏地分散。雖然礙於時間和空間的種種局限，即使對其他語種以及散佚於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相關檔案還未能全面、系統地收集和整理，但隨著大量檔案史料的出版和翻譯，研究人員有了更多可以共同使用的材料，不同史觀逐步靠攏接近，許多長期爭議的重大問題有望達成共識。而更多從本土視角審視內部社會演變的研究成果的產生，本土歷史知識及其解釋體系的輪廓也逐步明確，為日後撰寫澳門通史創造了必要的條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以本土學者主導撰寫澳門通史，將是本土歷史話語體系的最高表現，也將標誌著澳門歷史研究自主性的真正確立。

第四，擴寬了澳門歷史研究的視野，突出了澳門歷史的意義。長期以來，本地掌故式的鄉土研究和宏觀的中葡交往史研究各走極端，缺乏交集，更很少將澳門歷史置於中國史、亞洲史和全球史的廣闊視野中來審視。澳門港城的開埠，澳門的生存發展，與國勢國運的興衰絲絲相扣，緊密相連。澳門歷史的意義，當應放在中國史與世界史的高度方能突顯。澳門歷史城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充分肯定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在澳門共生共存的典範意義和普世價值。澳門歷史研究，當應高度重視其在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所發揮的特殊作用並為當今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的和諧進步作出更大的貢獻，突出小城市大歷史的功能和傳統。

最後，跨學科研究使研究方法不斷進步，研究領域不斷拓寬，研究成果不斷創新。澳門歷史

研究近 30 年的一大特色就是從掌故式研究走向學院式研究，研究方法從比較單一的政治學走向多學科和跨學科，研究主題也由中葡關係史擴散至澳門內部社會的諸多領域。隨著研究方法的改進，研究成果越來越專業，部門史論著作與日俱增且不斷有新發現、新觀點，研究質量也不斷提高，澳門歷史研究不斷向縱深方向發展，研究人員和大眾對澳門本土知識的認知要求日益提高。除非在外地從事澳門歷史研究的人員曾經在澳門居住過相當長的時間，而且期間又與本地居民有廣泛的接觸，否則他們將難以親臨其境地體會、也難以客觀地解答澳門歷史進程中的種種懸疑和問題。

## 二

澳門歷史研究話語權的回歸，還產生了兩種積極的效果，首先是澳門學術自主與澳門學的學科建設有條件得以順利開展，其次是在回歸澳門後對普世話語的正面反饋，而這種反饋又需要通過建設澳門學學科才得以實現。

經過多年的努力，澳門學從無到有，如今已轉型成作為本土知識體系而構建起來的學科。<sup>④</sup>由於澳門學建基於本土知識，對本土知識的發掘和論證因而需要科學的學術規範作為支撐，不但要使本土知識能成為真正的知識，也使澳門學本身能在嚴密的學術程序上建立起來，使其學科研究所提煉出來的成果具有普世意義且產生輻射作用。

從澳門歷史研究的普世意義看，我們始終認為，在西學東漸、東學西傳中扮演過不可替代角色的澳門的過去和現在是一個恒久彌新的話題。這不僅因為史料的不斷發現和研究的不斷創新給我們帶來喜悅，更加重要的是，在紛雜的當今世界，澳門歷史的經驗依然可以為人類文明的發展提供一條可行的路徑。

事實上，澳門在歷史上擔當近現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角色，華洋居民數個世紀以來在這塊彈丸之地共處分治，並未出現太多或者嚴重的衝突。這些事實相信沒有太多人會表示異議，而且得到越來越多人的認同。這種文化間對話的方式，或者說“澳門模式”的個中成功之處，一直是學術界加以探究的基礎課題之一，也是澳門學的核心內容。

澳門之所以成功扮演中西文化交流的平台角色，主要是由於澳門提供了中西文化相遇和對話的“公共空間”，同時澳門當時具備的獨特政治地位，使其兼備多重的社會身份認同，從而增進中國與西方世界之間的對話和理解。<sup>⑤</sup>這是我們提出“澳門模式”的一個重要出發點，而探索“澳門模式”的宏觀特徵和微觀內容，也正是“澳門學”學科建設的中心任務所在。

因此，我們認為，澳門學的學科建設和討論今後應該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確定學術規範的具體內容和技術操作，這涉及學術本體與認識論的確定問題；二是探索“澳門模式”的宏觀特徵和微觀內容，這是研究課題的取舍問題。

簡而言之，澳門史學研究已逐漸淡化民族主義色彩，擺脫政治爭拗的束縛，聚焦於內部社會的自然演變，同時為構建科學的“澳門學”學科奠定必要的基礎。由於歷史上的澳門地域狹小，同時又周旋於大國之間生存，雖然在展開歷史研究的進程中，內部社會演變不可避免地也深受外部因素的影響，但敘事的視角不可逆轉地指向了內部社會。這種轉變，是革命性的，是歷史性的。無心插柳，10 年後，驀然回首，我們發現，澳門歷史的話語權也悄然回歸了。

這不僅是一件頗值得史學界高興的事情，也是一件值得社會高度關注的大事。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澳門回歸祖國乃舉世矚目的歷史事件，特別行政區更是史無前例的新生物， “一國

兩制”、“澳人治澳”的偉大事業成功與否，在於一個全新的政治共同體的建立，而新政治共同體的建立和穩定有序發展，又在於政治主張與歷史敘述的有效表達和核心價值的形塑和解說。

在此一過程中，歷史敘事及其話語權是其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基礎因素，也是任何一個從殖民狀態走出來的國家或地區的必爭之物。符合歷史發展規律、客觀的歷史敘事，是建立新國家、新城市主流價值，增強國民、市民自信自尊的根本，直接影響家國觀念的形成及其價值取向，並直接影響政治、社會發展的走向。從這13年澳門特區相對平穩和諧的發展歷程看，我們走對了方向。大方向對了，原則性的紛爭自然就少了。為此，作為歷史學者，我們應該感到欣慰，高興地看到歷史學界以自己的專業為特區建設盡了一份綿力。

當然，實現“一國兩制”偉大事業是一項長期的工作，前路還充滿了挑戰，我們任重道遠，但義不容辭，有信心也有更好的條件繼續貢獻我們的力量。

①詳見金國平、吳志良：《挖掘原始檔案文獻，重現澳門歷史原貌》，載《鏡海飄渺》，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1年，第1～13頁；金國平、吳志良：《澳門歷史研究述評》，原載《史學理論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歷史研究所，2002年，第43～54頁，後收入金國平、吳志良：《東西望洋》，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2年，第1～21頁。近年的成果包括：吳志良、金國平、湯開建主編：《澳門史新編》（四卷本），澳門：澳門基金會，2008年；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六卷本），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澳門基金會、葡萄牙外交部檔案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澳門大學圖書館編：《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檔案》（清代部分·中文）（共十六冊），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9年；Rui Martins (Dir.), *DITEMA –Dicionário Temático de Macau*（《澳門專題史詞典》，四卷本），UNIVERSIDADE DE MACAU, 2010；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編：《美國駐中國澳門領事館報告（1849～1869）》，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以及一批較高水平的個人專著。

②鄧正來：《序言》，見吳志良：《澳門政治制度

史》，廣州：廣東省出版集團、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0～17頁。

③吳志良：《作為本土知識體系而構建的澳門學》，載《澳門學引論——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7～9頁。

④有關澳門學的討論，可參閱郝雨凡：《澳門學的範式和意義》，載《澳門學引論——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11～14頁；湯開建：《澳門學的起源及分期》，載《澳門學引論——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29～37頁；郝雨凡、湯開建、朱壽桐、林廣志：《全球文明史互動發展的澳門範式——論澳門學的學術可能性》，廣州：《學術研究》，2011年第12期。

⑤吳志良《澳門在中國走向世界中的作用》一文（“第五屆世界中國學論壇”論文，上海，2013年3月23～24日）集中討論了此一問題。

**作者簡介：**吳志良，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博士。

**[責任編輯 劉澤生]**